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與展望
——宋 代 篇

王 德 毅

一、

民國初年，廣東藏書家莫伯驥有言：「學者著書當如燕啄泥而爲巢，蜂采花而成蜜，於人於己須求有用，否則，歲不我與，來者難誣，徒爲辭費。」① 今世學者咸認爲史學是古今中外最有用之學。中國自三代以來便極重視史官之設立，如班固所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② 當春秋末，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確立了編年史體，《左傳》繼之，史學的門徑漸漸打開。至漢武帝時，司馬遷撰《史記》，又創紀傳體，以後史籍與時日俱增，自古傳下來的書籍，十之七八都與史有關，梁啓超指出其原因：

> 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很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爲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③

---

① 見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民國二十五年），莫培元跋文。

② 見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卷三十，〈藝文志〉。

③ 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排印本），頁一五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梁氏所言，中國史學成立最早，發展最快，自春秋末（西元前五世紀）至民國時期（二十世紀末），約計二千五百年，其發展的過程，也早已成爲一門專門之學，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梁氏乃提出撰一部中國史學史，應包括史官、史學的成立與發展，及最近史學的趨勢，每一部分都值得做專精的研究，而在梁氏講演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尚沒有一部簡明的中國史學史問世。到了民國二十年前後，國內各著名大學歷史系多開授中國史學史之課程，如梁氏弟子：陸懋德任教北平師範大學，衛聚賢任教暨南大學，皆編印有《中國史學史講義》，在校內流通。抗戰期間，金毓黻任教中央大學亦講授中國史學史，先編爲講義，經陸續增訂成書，於民國三十三年在重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勝利後重印於上海，列入教育部部定大學教科用書。民國六十二年，台北鼎文書局根據金氏修訂本重新排印，流傳益廣。目前國內大學史學系講授中國史學史者，多將金著列爲參考書。

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計分十章：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第二章、古代史家史籍，第三章、司馬遷與班固之史學，第四章、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第五章、漢以後之史官制度，第六章、唐宋以來設館修史之始末，第七章、唐宋以來之私修諸史，第八章、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第九章、清代史家之成就，第十章（即附錄）、近代史學述略。大致依循梁啓超所示：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與發展及最近史學的趨勢之大綱領，金著原版本有「最近史學之趨勢」一章，爲梁氏所最重視者，卻遭刪除了。以後各家之此類著作，多循此一架構，雖分章不同，然總離不開分述各時代之史家及其著作，以究明兩千五百年史學的發展。近半世紀以來，專治中國史學史的學者輩出，相關的專著也不斷問世，如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本），張孟倫《中國史學史》（甘肅人民出版社），劉節《中國史學史稿》（台北弘文館出版社重排本），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朱杰勤《中國古代史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陶懋炳《中國史學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倉修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宋衍申《中國史學史綱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白壽彝《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等，不下十種。尚有彙集各家專精論文之論文選集或論叢，海峽兩岸各有不同的貢獻。時至今日，中國史學史已成爲一門顯學。如宋衍申所指出的：

> 隨著時代的前進，一向發達的中國歷史學，肯定會更加發展。毫無疑問中國史學史研究也要有一個相應的發展。④

這從半世紀來諸家所撰中國史學史專著不斷的問世，可以得到證明。

二、

上述中國史學史之專著，乃是通史，重在貫通古今。事實上，做斷代史學之研究，則更能專精。在中國二千五百年的史學發展過程中，宋代史學特別興盛，梁啓超曾說：「人們只說宋代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梁氏指出宋代第一流的史學家歐陽修「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要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司馬光矯正斷代的編年史，而成貫通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的《資治通鑑》，創通史的編年史體，「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⑤ 所以說：《通監》經緯規制極宏偉，確是漢代以降的一大創作。南宋的鄭樵撰《通志》，其〈二十略〉貫通隋以前各代正史的書志，擴大典制文物的範圍，以新的觀念，用新的方法，摘要歸類，不失爲專門之實學。如清代史家章學誠所說：「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虫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

---

④ 見宋衍申，《中國史學史綱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前言〉。

⑤ 同註三，頁一五九至一六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⑥ 實爲一大創作。至於朱熹纂《通鑑綱目》，遂創綱目體，袁樞纂《通鑑紀事本末》，遂創紀事本末體。上述五位史家之著作，都足以開創後世史學的新蹊徑，而示來者以軌則。既然宋代史學如此其興盛，所以民國以來研究宋代史家、史書、修史制度，以及史學思想者特別多。德毅在民國八十二年四月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主辦之「宋史教學研討會」上，發表〈宋代史學的教學〉一文，特別提出宋代史學的特盛原因有五：一、重文輕武的政風，二、經世致用的學風，三、金石學與目錄學之發達，四、疑古惑經的文風，五、朝廷的獎勵，此五者是相互爲用的。並認爲：通史的重視，編年史體的興盛，史書中的義理觀念，歷史考證學的新風氣，以及史籍的廣泛，又共爲宋代史學的特點。⑦ 這些新的發展，是與宋代的國家處境密不可分的。當然宋代開國於唐末五代藩鎮作亂、國土分裂之餘，民困兵弱，外患嚴重，朝廷常以民族大義相倡導，士大夫亦無不以忠君愛國之志操相激勵。於是在史書的編修上，輒本《春秋》精神，內中國、外夷狄，誅亂臣、討賊子，於治亂興亡之故，究明之最精切。史學是有用之學，前代的成敗得失、治亂興衰，固是最好的教訓；本朝的施政用人、利病善惡，也是應當不斷檢討改進的，所以不論修前代史或當代史，都是宋代史家共同努力的，他們所修成之史書，卷帙極浩瀚，貢獻最宏偉。前輩學者張舜徽曾撰文論述宋代學者治學的博大氣象及替後世學術界所開闢的新途徑，非常稱許，尤其是宋人對當代史事之整理和編修，成就最大，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空前的。他說：

> 宋代史學的最大特色，便是詳于當代史跡的記述，能夠及時地把現實的社會變化和政治得失編寫成書。這是宋代史學最成功的地方。也只

⑥ 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國史研究室彙印本，民國六十一年），內篇〈申鄭〉，頁一三四。

⑦ 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編印，《宋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二七至一三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宋人有此魄力。⑧

這足以說明宋代史學之盛，爲近代研究史學史的學者所一致認定的。

關於宋代官修前代史與本朝史的制度，前輩學者多已留心研究。早在民國三十一年，金毓黻撰〈唐宋時代設館修史制度考〉，發表在《說文月刊》三卷八期上，他指出：「宋代修史制度視唐代爲進步，亦爲元明以下所不及，故史料之豐富冠絕古今。」宋代官修之前代正史，以《新唐書》最具代表性，學者論述此書編修之背景，綜評其史學價值，多從研究歐陽修的史學來討論，如何澤恆著《歐陽修之經史學》（臺大文史叢刊，民國六十九年出版），分上下兩篇，其下篇爲〈史學〉，第一章便是敍述《新唐書》。尙有劉子健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新文豐出版公司），蔡世明的《歐陽修的生平與學術》（文史哲出版社），劉德清《歐陽修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均有所綜述。其他單篇論文尙多，不再逐一例舉。至於宋代官修本朝史，則論述者甚多，德毅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曾先後發表六篇相關的專論，早於民國五十二年即在《幼獅學誌》二卷一期上發表〈神哲徽欽四朝國史纂修考〉一文，其後陸續撰成〈北宋九朝實錄纂修考〉（《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十一期），〈兩宋十三朝會要纂修考〉（《國立編譯館館刊》四卷二期），〈宋代的日曆和玉牒之研究〉（《臺大歷史系學報》第十、十一期合刊），〈宋代的聖攷和寶訓之研究〉（《中國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大學）和〈宋代的起居注與時政記之研究〉（《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皆是從各類史籍的起源探討起，次及纂修的史官、義例、過程、內容，以及修成後進呈的時間和禮儀，並述及因修史所引發的爭議，都是相當深入的。民國八十年，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大學蔡崇榜的博士論文——《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就官修本朝史的制度做了全面探究，但對玉牒、聖政、寶訓並未立專章來敍述，僅在第九章〈其它史書的修纂〉中約略述及。此書出版後，舟楫曾在《文史雜志》1994年第四期上發表了〈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從蔡

⑧ 見張舜徽，《中國史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頁一〇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崇榜近著說海峽兩岸宋史研究交流〉一文，稱道蔡著的特別貢獻有三：一、全面而有系統地探討宋代修史制度，二、將宋代修史制度與修史實踐結合起來研究，三、重視因革損益。雖言之有據，而蔡著在第十章中評述宋代修史受皇帝干預一事，則不盡合乎事實。要知眞正干預修史的是權臣、奸臣，如秦檜、韓侂胄專政之日，皆曾有私史之禁，而宰相監修國史，提舉修日曆、實錄，史官都要承其意旨，所修之史書自然就難以信實了。據〈中興藝文志〉云：

> 《高宗日曆》，初年者多爲秦檜改棄，專政以後，紀錄尤不足信。韓侂胄當國，《寧宗日曆》亦多誣。後皆命刊修。然《高宗日曆》、《時政記》亡失，多不復可考。⑨

秦檜專政十八年，起居郎、起居舍人常缺而不補，其間有十五年未修起居注，而時政記也沒依照舊規撰送史館。又檜子熺以祕書少監兼修國史，完全顚倒是非，高宗原先是無法知道的，至檜死後，始由湯思退、洪遵、楊邦弼等奏知。拙撰的〈宋代的起居注與時政記之研究〉一文，考證明確。不僅權臣干預官修之本朝史，甚至私修之國史亦加禁絕，並將撰修者捕之入獄，成了宋朝僅見的文字獄，實屬不幸。據李心傳記載：

> 頃秦丞相既主和議，始有私史之禁，時李忠簡光嘗以此重得罪。秦相死，遂弛語言律。近歲私史益多，郡國皆鋟木，人競傳之。嘉泰二年春，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請取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王季平（稱）《東都事略》、熊子復（克）《九朝通略》、李柄（丙之訛）《丁未錄》及諸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乞即存留，不許刊

⑨ 見馬端臨，《文獻通考》（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十通本），卷一九四，〈經籍考〉二十一，〈高宗日曆〉條引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其餘悉皆禁絕，違者坐之。⑩

權臣畏懼私撰之當代史所記述者不利於己，故主導私史之禁，帝王只是俯從其請而已！皇帝深居宮中，不能兼視兼聽，是無法看到私家所修之當代史的。

有關宋代重要史籍的研究，值得稱道的很多，先就《宋會要輯稿》而言，這部巨典是清代學者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問世。在此之前，湯中曾編集〈宋會要考略〉、〈兪正燮宋會要輯本跋考證〉和〈大典本宋會要輯訂始末〉三文，而成《宋會要研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卷帙繁重，查檢不便，日本東京東洋文庫曾編有《宋會要研究備要》，乃是編詳明目錄。民國六十七年，德毅編成《宋會要輯稿校勘記》，校正一千一百多處錯字和脫漏、衍文，極有參考價值。十二年前，河南大學王雲海撰成《宋會要輯稿研究》，由河南師範大學學報排印問世。稍後他又著《宋會要輯稿考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除對輯稿殘缺部份做了全面的校補外，更重編了〈篇目索引〉，較之《備要》完善多了。今年夏初，陳智超新著《解開宋會要之謎》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排印問世，其下篇逐類詳列輯稿目錄，遇有歸類錯誤或重複的，也一一指出，並重加調整，列出較妥切之新目錄，而名之曰「復原」，可稱爲一項新的嚐試。至於宋廷修會要的經過，德毅所撰〈兩宋十三朝會要纂修考〉（載《宋史研究集》第十一輯，民國六十八年出版），有極詳細的論述。民國六十七年，拙編《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問世，檢尋極便。另外，日本東洋文庫宋史研究室編成《宋會要輯稿·食貨索引》，分人名、書名、年月日、詔勅及職官篇陸續出版，惜未及於其他各類。一九九四年春，日本學者梅原郁所編的《宋會要輯稿編年索引》，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這些都是極有用的工具書，對研究工作幫助很大。

宋代最精博的史學巨著，要算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民國以來，研究

---

⑩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甲集卷六，〈嘉泰禁私史〉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鑑》的學者最多，發表的論文，出版的專書，洋洋大觀。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崔萬秋撰《通鑑研究》（商務印書館），內容雖簡，仍足以開一時的風氣。次年，王緇塵著成《資治通鑑讀法》（世界書局），有啓迪後學之功。眞能做深入的研究者，則爲張須的《通鑑學》，正式將《通鑑》一書提升爲一項專門學問。張須推崇司馬光說：

> 夫著書易事耳，而粹白爲難。溫公外無驅迫，內無憤矜，獨本其利益學人之念，假帝王之力，官屬之賢，以大官而躬下士點校之勤；十九年中，固已（司馬）遷、（班）固所不能驕，族史所不能玩。進而察其言，則又平謹恭遜，欿然不足以自發其獨有千古之奇。噫！是人也，殆合良史與君子爲一人。夫合良史君子爲一人，則史之負人也常少，而其作鑑也，乃果足爲天下平，是則溫公之所以詔萬世也。⑪

司馬光具良史之才，懷君子之心，發爲史論，期以澤民而利物，有助於治國平天下。張氏在《通鑑學》中所述司馬光的史學，極有建設性，不止讚嘆光搜採史料之宏富與精力之過人，而且認爲他思想之超然，不俯隨於流俗之見，其所深造自得之識，尤具有倚天拔地之偉觀。⑫ 都是相當肯定的。到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正逢《資治通鑑》成書九百年周年，執教北京師範大學的劉乃和與東北師大的宋衍申相約分向同道徵文，編成《資治通鑑叢論》，收論文十七篇，其首篇便是宋氏撰的〈資治通鑑研究概述〉，簡述《通鑑》成書後之九百年間，或續或注，或補或評，或改編而創新史體，如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是。或斷代而成一代之書，如夏燮《明通鑑》是。近數十年間，研究《通鑑》的學者輩出，專著和論文亦不斷出版，故宋氏說：「《通鑑》及其有關的著作的研究，已成爲學術界一項專門的學

---

⑪ 見張須，《通鑑學》（開明書店），〈自序〉。

⑫ 見《通鑑學》，頁一二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⑬ 這是不爭的事實。同年十二月，劉、宋二氏另編《司馬光與資治通鑑》，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與《叢論》互相補益，這是一部《資治通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劉氏又於《博覽群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中國史學史上的驕傲——資治通鑑成書九百年〉一文，堅定不移的說：「司馬光寫的《通鑑》，在中國文化史、史學史、史料編纂學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一直到今天，《通鑑》還有其生命力。」⑭ 資治的功能將是永永遠遠的。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是王安石和司馬光逝世九百週年，爲了紀念這兩位先賢，國立政治大學主辦了一次學術研討會，有關司馬光《通鑑》的論文共有五篇。德毅早在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曾撰〈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一文，另對助修《通鑑》的三位史學家：范祖禹、劉恕和劉攽皆各撰一文論述其史學，對《通鑑》的分修工作探討甚詳。在紀念司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德毅宣讀〈司馬光的史學〉，宋晞提出〈從資治通鑑看司馬光史論〉，皆更進一步申論《通鑑》的史學貢獻和影響。

近十多年來，又不斷有新的專著出版，舉其要者，如張敬琪《通鑑研究》（遠流出版社），黃盛雄《通鑑史論研究》（文史哲出版社），陶懋炳《司馬光史論探微》（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潘英《資治通鑑司馬光史論之研究》（明文書局）等，對《通鑑》中之「臣光曰」作深入之分析。史學家研究前代史，總有一些個人的看法，於是借着纂修前代史，隨事舒發心得，闡明義理，來強調修書是負有重大使命的。司馬光在《通鑑》中所發舒的議論，正代表他的政治立場。黃盛雄指出「通鑑包攬洪博，選擇精審，史料的處理十分精當。」此乃事實，當然是無庸多所敍述的。其次則論及司馬光獨特的史識，且史識又爲史家所必備的。

南宋時代，國家的處境很困難，宋高宗只營造了一個偏安的局面，向金朝稱臣貢歲幣，締結和約。士大夫有感於時勢多艱，非常留心於當代史之編纂，如李燾修《續資治通鑑長編》，敍述北宋一祖八宗的政治史，多達九百八

⑬ 見《資治通鑑叢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一至四十五。

⑭ 見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頁三三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卷。李心傳繼之，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只述高宗一朝，也多達兩百卷。徐夢莘更感念生於靖康元年（一一二六），次年即發生靖康之難，他要考究這次國家大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乃搜集官私文牘和朝野記錄之書，修成《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對這三位南宋史學家之研究，德毅早年皆編有年譜，詳述其生平。民國五十一年，世界書局影印《續資治通鑑長編》，楊家駱特撰《長編輯略》四卷置於首冊，又特別在新定本之序文中提到明成祖敕修的《永樂大典》中所引錄的宋人著作。[15] 二十年前，大陸學者裴汝誠、許沛藻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就版本著錄、撰修始末、修換事目、取材和注文五者分別考求其事略，頗爲詳明，爲近年所僅見。其前言云：

> 李燾繼承我國以歷史爲鑑戒的傳統，主張研究時間接近，事機相近的前朝歷史，力圖爲南宋王朝制定政策提供借鑑，有益謀謨，這正是他密切關注現實的報國激情，在治史精神方面的體現[16]

李燾不失爲一位愛國的史學家，他在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向孝宗進呈《四朝錄》時，一再申述金國世仇，不共戴天，要堅定復仇之志，不可因目前的和平而懷苟安。孝宗看了以後，說：「朕可一日忘此仇哉！」正是以史爲鑑的。他又撰《六朝制敵得失通鑑博議》，意在鑑六朝之失，而求今日應如何補救方爲得，是完全爲南宋立言的。李心傳承襲李燾，不僅學燾修史的義例，也延續了燾的史學思想。一九九〇年來可泓著《李心傳事跡著作編年》，內附〈李心傳評傳〉，推崇心傳重視當代史之研究，這實在是需要絕大的勇氣和毅力。[17] 至於徐夢莘的史學貢獻，前輩學者陳樂素撰有〈徐夢莘考〉和〈三朝

---

⑮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世界書局影本，民國五十一年），第一冊前附楊家駱所撰序文。

⑯ 見裴汝誠等，《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前言）頁三。

⑰ 見來可泓，《李心傳事跡著作編年》（巴蜀書社，1990年），頁二五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盟會編考〉二文，論及《會編》中所徵引的二百多種史料，多爲今世不傳之書，則此二百多種之原始史料，「不特爲研究宋、遼、金當時相互交往與軍事關係最重要之根據，且當時三國之政治上、經濟上、地理上、民俗上、社會上，以至一部分人之個性、私生活及特殊事件之經過種種材料，蘊藏於其中者，亦極豐富，留以待今日史家之開發。」⑱ 保存史料的功勞，誠然是不容抹殺的。

至於纂修史書的史體，上古時代只有編年體，至漢司馬遷撰《史記》始創紀傳體。唐代杜佑修成《通典》，後世稱爲書志體或政書體。降及南宋，袁樞利用《資治通鑑》的內容，改編年爲紀事本末，以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爲中心，歷述其發生、經過和結果，於是產生紀事本末體 。朱熹也據《通鑑》之記事，纂其大要，「挈提以綱，而記載以目」，於是有了綱目體。這兩個新史體的產生，證明了史學的發展已極爲進步，對此後歷史教育的增進也有極大的幫助。袁樞所關注的大事是歷代的大動亂，如大盜、夷狄、藩鎮、諸侯等之叛逆，造成全國性的動盪不安；而外戚、宦官、權臣、朋黨之亂政，也造成朝廷政局之不安；他的《通鑑紀事本末》，就是專以這些重點爲取材。朱熹則是本《春秋》大義，用言簡明確之筆，意含褒貶之辭，載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變遷。於事則強調正當與否，於人則嚴分邪正忠奸，於歷代政權則評斷何者爲正統，何者爲僭僞。極爲嚴正，故其自詡爲繼《春秋》而作。三十多年前，陳光崇發表〈袁樞與通鑑紀事本末〉一文，指出袁氏之《本末》，「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描繪出一個發展的線索。」認爲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⑲ 但就整體觀之，他重在提醒君主和大臣留心前代覆車之鑑，並非只載動亂不載安定。尤其是強烈的夷夏觀念，對民族大義的

---

⑱ 陳樂素二文，撰於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分別發表於《國學季刊》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八四年收入《求是集》第一輯（廣東人民出版社）中，此段引文見該集一〇四頁。

⑲ 見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頁二五四至二六〇；〈袁樞與通鑑紀事本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揚是有重大意義的，拙撰〈袁樞與通鑑紀事本末〉言之甚詳。⑳ 近半世紀以來，研究朱熹史學的學者漸漸多了，錢穆所撰的〈朱子之史學〉，推崇朱子史學博大精深，附論〈朱子通鑑綱目及八朝名臣言行錄〉，謂朱子修《綱目》有書法褒貶，皆親自酌定。對於《通鑑》的原文，也以特筆刪修，是一部有中心思想的著作。然論及《綱目》的成書，列舉朱子與蔡元定等之八通書信，則直斷說：「今傳綱目，則實多成於趙師淵之手。」㉑ 然近年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如葉建華便撰〈論朱熹主編綱目〉，則說：「朱喜論綱目手書十二篇，其中有與趙師淵書六篇。……我們把它們逐篇仔細分析一番，却並不能得出《綱目》一書『全出訥齋』的結論來。」又說：「趙師淵之於綱目，與蔡季通諸人一樣，只能看作是朱熹編撰此書的助手，一切還是聽從主編的指導。」㉒ 也是言之有據的。朱熹記述歷史人物，多從心術上來看，評論的很精闢。他以爲前代君臣建立事功固然重要，能堅守倫理道德更重要。張元所撰的〈朱熹對歷史人物的看法〉，論述前人功過，不以成敗，而是看其本領高下，能正心誠意以至修齊治平，便是本領大。觀古人心術，便可明其言行是非。朱熹不責諸葛亮出師北伐之失利，而獨褒其興復漢室之誠心，此之謂志士仁人之用心。㉓ 正是從心術上來論定的。

宋代史家亦治典制史，南宋鄭樵撰《通志》，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都是不朽之著作。民國初年，顧頡剛撰〈鄭樵傳〉及〈鄭樵著述考〉二文，刊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中，對鄭樵史學成就備極推崇。至一九八一年，吳懷祺撰〈鄭樵在歷史編纂學上的成就〉（《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4

---

⑳ 拙撰，〈袁樞與通鑑紀事本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第十二、十三期合刊，民國七十五年。

㉑ 見錢穆，《朱子新學案》（民國六十年自刊本），第五冊，頁一二〇至一四八。

㉒ 葉建華，〈評朱熹主編綱目〉，《文史》第三十九期，1994，頁二七一至二七六。

㉓ 見張元，〈評朱熹對歷史人物的看法〉，《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頁四三至五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對樵恢復紀傳體之通史，改志爲略，會通各種專門學術，而成一家之言，成就極大。吳氏特加讚揚地說：「鄭樵以多種知識多角度地透視封建社會，……人類歷史在更廣闊的視野中被反映出來。他對歷史的觀察是一種宏觀式的理解。」確是很中肯的論斷。德毅在民國八十年發表〈馬端臨與文獻通考〉一文，論述《通考》會通古今，保存文獻，博徵廣引，集歷代正史表志之大成，爲天地間不可一日或缺的史書。㉔ 一九九四年，大陸學者王瑞明邀請專研中國文獻的十七位學者，分別就《通考》二十四考加以評述或探析，而成《文獻通考研究》一書，由香港學峰書屋出版（1994），是研究《通考》內容最廣泛的著作。至於其他宋代的著名史學家，如劉攽、劉恕、范祖禹、孫甫、呂夏卿、宋敏求、王稱、洪邁、呂祖謙、黃震、王應麟等，四十多年來，都有學者進行專門研究他們的史學貢獻，這些論文太多了，也有輯爲專書的，實難以一一遍舉。宋代史學之盛極一時，於此亦可得到證明了。

宋代史學家之地區分佈有集中現象，頗值得注意，約言之，以江西、四川最多，浙東、福建次之，北方各路較少。研究一個地區的史學發展及其特點，也極有意義。民國二十五年，萬福曾撰〈宋南渡後蜀中之史學〉，刊於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的《大公報文史周刊》上。文字雖簡，頗能開風氣之先。近年蔡崇榜撰〈宋代四川史學的特點〉（《西南師大學報》1986 年第四期），乃是繼前文而作。三十多年前，廈門大學歷史系成立鄭樵研究小組，專研鄭樵史學。如推而及於袁樞、朱熹、陳均等，則可成宋代福建的史學。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宋晞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中宣讀〈南宋浙東的史學〉，指出浙東史家輩出，由治經而治史，著重經世致用，影響及於元、明、清，至深且遠。㉕ 至於宋代江西的史學，至今尚未見有專文論述。

㉔ 拙撰，〈馬端臨與文獻通考〉，《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國八十年，頁三一三至三三二。

㉕ 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中冊，頁六七三至六九八，民國七十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

史學家修史，不僅要敍明歷史事實，在修書過程中，還要對史料的鑑別，做適當的考證，如司馬光修《通鑑》，特做《考異》，說明史料之去取，其方法是值得仿傚的。史實要借文字呈現出來，然不同的用語，就會有不同的涵義，甚至出現不同的解釋，如孔子修《春秋》，簡而且嚴，有所謂一字褒貶，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朱熹修《通鑑綱目》，都是法《春秋》的，所以對史學思想的探究，亦屬重要課題。中國自三代以後，朝代有興亡，政權有起落，在大一統的思想之下，正閏之辨，也是常爲史學家所關注的。對史學家的研究，必先從其所生存的時代去考量，以了解其修史的動機，同一時期的史學家所修的史書，也有一共同的特點。德毅在所撰的〈宋代國家處境與史學發展〉一文中，曾提到北宋史學家喜治唐史，其立意在以唐爲鑑。南宋史家愛研蜀漢、東晉及南朝史，多討論南北攻守形勢，這又是就南宋的國家處境立言的。不過宋代史家的共同點則是重視史學中的義理觀念，強調尊王攘夷，從大是大非的觀點立言，而不計其小惡小善，南宋的史學發展，更爲突出，且與時代密切相接，既能發揚《春秋》精神；又能宣導儒家的倫理德治，史學著作的質與量都提升了，給人以無限的精神力量。㉘

宋代史學家是有使命感的，他們修史爲了經世，庶使國家太平，時代進步，最低限度也能有助於端正人心，有益於風俗教化，他們的史學思想值得研究。吳懷祺撰《宋代史學思想史》，討論到理學家程顥、頤的歷史觀，邵雍的歷史哲學，朱熹理學與史學的結合，司馬光和馬端臨的歷史編纂學思想，這也是一項新課題。他有感而發的說：

> 宋代史苑在中古時期是群芳競艷的園地，史著繁富，史書體裁增多，

㉘ 拙文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已彙印爲論文集，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史家緊貼著現實的脈博作出反映，對歷史認識向哲理化方向發展，這些方方面面的成就使人眼花繚亂。㉗

宋代史家衆多，史籍繁富，等待我們研究的太多了。二十世紀史學家對宋代史學的研究，已有了豐盛而輝煌的成果，展望未來，繼續研究，必將更爲精審又博大，如能有賢者出，集其大成，寫出一部「博而得其要」的宋代史學史，將是吾人所期盼的。

㉗ 見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黃山書社，1992年），〈後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